

# 民国学人对朱熹与陆王的调解

乐爱国

**摘要:**民国时期不少学者都对朱熹与陆王的异同有过论述,既有如汤用彤、谢无量、钟泰、吕思勉等学者讲二者小异而大同、殊途而同归,又有唐文治、贺麟、钱穆等学者从各种层面对二者进行调和;冯友兰等学者虽然将二者对立起来,但仍然强调二者在学术层面以及经世致用层面上的互为补充。这就是贺麟于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在总结当时中国哲学研究时所提出的,理学中朱熹与陆王两派的对立“得了新的调解”。这与现今较为突出朱熹与陆王两派的差异与对立,形成鲜明对照。

**关键词:**民国时期;朱熹;陆王;调解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4)05-0001-07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07)

**作者简介:**乐爱国,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 361005)。

1932年,冯友兰发表《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不赞同学术界只是从为学或修养方法的层面,用朱熹偏重道问学、陆九渊偏重尊德性来区别朱熹与陆九渊,而是从本体论的层面对二者做出区分,指出:“朱陆之不同,实非只其为学或修养方法之不同;二人之哲学,根本上实有差异之处。……若以一二语以表示此种差异之所在,则可谓朱子一派之学为理学,而象山一派之学,则心学也。”“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二言虽只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的差异。”又说:“朱子言‘性即理’;阳明言‘心即理’。此为理学与心学不同之处。”<sup>①</sup>在冯友兰看来,朱熹与陆王的差异在于:朱熹讲“性即理”,为理学;陆王讲“心即理”,为心学。这一观点被纳入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对民国时期乃至后来的朱子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贺麟于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却认为,理学中朱熹与陆王两派的对立“得了新的调解”是当时中国哲

学“可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重要方面之一<sup>②</sup>。也就是说,民国时期,学者们更多的是讨论朱熹与陆王的调解,而不是强调二者的对立。

## 一、小异而大同,殊途而同归

民国时期对于朱子学的专门阐述,可以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该书专门就朱陆两派的形成发展以及朱陆的差异作了具体阐述。此后,一直有学者对此进行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更多学者是强调朱熹与陆王的小异而大同,殊途而同归。

1914年,汤用彤发表《理学谥言》,在讲理学为“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的同时,又说:“理学中之大者曰程朱,曰陆王。程子沈潜,至晦庵而其学益密;陆子高明,至阳明而其学益精,一则酿有宋一朝之学风,一则酿有明一代之文化,是皆讲学之力也。”<sup>③</sup>显然,在汤用彤的救世“良药”中,朱

<sup>①</sup> 冯友兰:《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清华学报》1932年第8卷第1期。

<sup>②</sup>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第3页。

<sup>③</sup> 汤用彤:《理学谥言》,汤一介编选《汤用彤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子学与陆王之学是相互补充的。关于朱熹与阳明的异同,汤用彤说:“二先生之学各有其本根,故曾相抵牾,而其大别则阳明以格致为诚意,紫阳先格致而后诚意,然而最吃紧处,皆在慎独则无所同异也。……至如朱王之异同优劣,记者所不能言,亦不敢言,使释一端之争执而同进于大道。”<sup>①</sup>明显较为强调朱王之小异而大同。

1915年,程南园在《国学杂志》上发表《与友人论朱陆书》,对朱子之学与陆王之学作了比较,指出:“朱子之学随所用而辄效,文安(陆九渊)、阳明之学亦随所用而辄效。虽朱子全而陆与王稍偏,然皆足为圣人之功臣,国家之砥柱。后之学者诚不以空言欺世,何妨推先儒学之有用者为殊途而同归哉!”<sup>②</sup>。在他看来,朱子学与陆王之学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就救国治世或社会功用而言,是相互补充而殊途同归的。

1915至1916年间,谢无量先后出版了《阳明学派》、《朱子学派》和《中国哲学史》,对朱子学与陆王之学的异同作了全面的分析。对于陆的差异,谢无量说:“朱子尝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缺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者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此可为二家异同之定评。”<sup>③</sup>他又概括指出:“陆学尚简易直截,朱学重学问思辨;朱学在‘即物穷理’,陆学言‘心即理’。一主于经验,一主于直觉;一主于归纳,一主于演绎。此其所以卒异也。”<sup>④</sup>就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差异而言,谢无量说:“程朱论格物致知,重在事实之经验;阳明论格物致知,重在良心之悟彻。宋明以来论格物,多此二大派之绪也。”<sup>⑤</sup>但是,谢无量又强调朱

子学与陆王之学的共同处,认为朱陆“于学术虽有争辩,而交谊固其笃也”<sup>⑥</sup>、“阳明与朱子之学,相异之处固多,其中固未尝无符合者”<sup>⑦</sup>,甚至还认为,陆九渊以及后来王阳明的“心即理”说,与朱子讲“心、性、理之一贯”以及“理在心中”,“亦无以异矣”<sup>⑧</sup>。

1924年,张恩明发表《述朱陆学说之异同及其得失》,从多个方面对朱陆学说之不同作了专门论述,重申了谢无量对朱陆学术差异所作的总结,同时又认为,朱陆两派“亦有其同者在,即均主性善说是也”,所以,“一言以断之曰:目的同而方法异,所谓殊途而同归者,二贤有焉”。他还说:“总之,朱陆两派学说,对于吾国世道人心,大有联谊。非可以等闲视之者。”<sup>⑨</sup>

1927年,陈复光发表《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之大别》,指出:“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之大别:一在精一博约,尽心知性,由外而之内者也;一在良知良能,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由内而之外者也。……二氏之说虽异,而其心则一也。故阳明日:‘吾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sup>⑩</sup>其后来发表的《阳明学派与朱子学派之大别》,在讲朱子学与阳明学小异而大同,殊途而同归的同时,还说:“朱子外求之心学与阳明内求之心学,可以为吾国人针砭矣。”<sup>⑪</sup>可见,陈复光是从“心学”的角度阐释朱子之学,并认为朱子学与阳明学大同小异,是互为补充的。

1929年,钟泰《中国哲学史》第三编第十二章附“论朱陆异同”,既讨论朱陆的差异,又强调二者的相同,指出:“盖子静所说,是尊德性事;晦翁之谈,则道问学为多。……《中庸》言‘诚则

① 汤用彤:《理学谥言》,汤一介编选《汤用彤选集》,第13页。

② 程南园:《与友人论朱陆书》,《国学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第16页。

③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近世哲学史(宋元)》,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第71页。

④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近世哲学史(宋元)》,第72页。

⑤ 谢无量:《阳明学派》,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第146页。

⑥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近世哲学史(宋元)》,第72页。

⑦ 谢无量:《阳明学派》,第136页。

⑧ 谢无量:《朱子学派》,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第119页。

⑨ 张恩明:《述朱陆学说之异同及其得失》,《东北》1924年第2期。

⑩ 陈复光:《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之大别》,《清华周刊》1927年第27卷第10号。

⑪ 陈复光:《阳明学派与朱子学派之大别》,《清华周刊》1927年第27卷第15号。

明，明则诚。’诚则明，先尊德性而后道问学也；明则诚，先道问学而后尊德性也。然则两先生之异，何伤于两先生之同乎？”<sup>①</sup>因此反对朱陆论辩而形成的门户之见。

1931年出版的吕思勉《理学纲要》对朱陆之异多有讨论，指出：“朱陆之异，象山谓‘心即理’，朱子谓‘性即理’而已。惟其谓‘性即理’，而‘心统性情’也，故所谓性者，虽纯粹至善，而所谓心者，则已不能离乎气质之累，而不免杂有人欲之私。惟其谓‘心即理’也，故万事皆具于吾心；吾心之外，更无所谓理；理之外，更无所谓事。一切工夫，只在一心之上。二家同异，后来虽枝叶繁多，而溯厥根源，则惟此一语而已。”<sup>②</sup>但他同时又说：“然二家谓理在心之内、外虽异，而其谓理之当顺则同。”<sup>③</sup>所以，在吕思勉看来，陆子之说“与朱子初无以异。此其所以途辙虽殊，究为一种学问中之两派也”<sup>④</sup>。

事实上，在民国时期，虽有不少学者关注朱熹与陆王之学的差异，但大都认为二者小异而大同，殊途而同归。当然，在论述中，讲二者的“小异”、“殊途”较多，也较为细致、深入，而对于二者的“大同”、“同归”则阐述较少，往往缺乏深入的分析。

## 二、各种层面的调和

随着朱子学研究的深入，民国学者对于朱熹与陆王的异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出现了各种调和朱熹与陆王的倾向，以唐文治<sup>⑤</sup>、贺麟最为明显。

### （一）唐文治工夫论层面的调和

1930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编

著《紫阳学术发微》和《阳明学术发微》，对朱熹与陆王的学术异同作了深入讨论。

朱熹曾经说过：“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sup>⑥</sup>于是，有些学者以为朱陆之异在于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朱熹“以道问学为主”。对此，王阳明早就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今观象山文集所载，未尝不教其徒读书穷理。……晦庵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sup>⑦</sup>黄宗羲《宋元学案·象山学案》虽然讲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朱熹“以道问学为主”，但又说：“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陆九渊）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异耳’。”<sup>⑧</sup>

针对所谓朱陆之异在于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朱熹以道问学为主，唐文治特别强调在朱熹那里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不可分离。他引朱熹晚年的《玉山讲义》所言“《中庸》所谓‘尊德性’者，正谓此也。然圣贤教人，始终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细无有或遗，故才尊德性，便有个‘道问学’一段事。虽当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两事也”，以及“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缺处矣”，认为这是朱熹学术的“归宿处”<sup>⑨</sup>。唐

① 钟泰：《中国哲学史（卷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59～60页。

② 吕思勉：《理学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17页。

③ 吕思勉：《理学纲要》，第126页。

④ 吕思勉：《理学纲要》，第126页。

⑤ 唐文治（1865—1954），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著作主要有《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疏》《十三经提纲》《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等。唐氏自称“治朱子学五十余年”，著有《性理学大义》《紫阳学术发微》《阳明学术发微》《性理救世书》等。《紫阳学术发微》在清代朱子学研究的基础上，分朱子为学次第、心性学、仁学、经学、政治学以及朱子与道释、陆子学、浙东学的关系等诸多专题，分别予以评述，并附若干专题研究论文，既反映了朱熹的主要学术思想，又展现清代朱子学研究的基本要点，同时表明了作者对于朱熹学术思想以及清代朱子学的基本观点，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朱子学研究专著。

⑥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项平父》（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21《答徐成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07～808页。

⑧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86页。

⑨ 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卷4，《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第1编88册），台中：文听阁图书公司，2010年，第84页。

文治还说：“若夫朱子之学重在道问学、陆子之学重在尊德性之说，此盖朱子谦抑之辞，岂可各标宗旨？”<sup>①</sup>因此，他反对所谓朱熹以道问学为宗、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而把朱陆之学对立起来的说法。他还说：“朱子《中庸》注云：‘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是尊德性，即程子所谓‘涵养须用敬’也；道问学，即程子所谓‘进学则在致知’也。二者有兼营并进之功，无背道分驰之理。朱子道问学，即所以充其德性；而陆子尊德性，则不过明其昭昭灵灵之体而已。此不可不辨也。”<sup>②</sup>

显然，唐文治对于朱熹与陆王的调解，已经不是简单而不加分析地讲朱熹与陆王的小异而大同、殊途而同归，而是通过深入分析朱熹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既讲道问学，又重视尊德性，进而调和朱熹与陆王。当然，这种只是在工夫论层面上对于朱熹与陆王的调解，依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 (二) 贺麟本体论层面的调和

1930年，贺麟发表《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通过比较朱熹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异同，认为朱熹的“太极”实含有三种不同的意思：第一，“朱子的太极就是他‘进学在致知’所得到的理，也就是他格物穷理，豁然贯通所悟到的理。这个太极就是‘道理之极至’，就是‘总天地万物之理’……这个理就是朱子形上学的本体（宋儒称为道体），就是最高范畴”。第二，“朱子的太极又是‘涵养须用敬’所得来的一种内心境界。朱子前说释太极为理，大都用来解释周子的太极图说，建立他的宇宙观，而此说认太极为涵养而得之内心境界，则目的在作对人处事的安心立命之所”。第三，“朱子于其诗歌中不知不觉地把他的太极具体化作一种神仙境界”。贺麟还说：“朱子有时认心与

理一，有时又析心与理为二。有时理似在心之外，如‘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等语的说法。有时理又似在心之内，如‘心统性情，（性即理，情属气）及‘所觉者心之理也’等处”<sup>③</sup>，所以，贺麟认为朱子“介乎唯心与唯实、一元与二元之间”。对于该论文的观点，贺麟于1938年的一篇论文中说道：“七、八年前，当我作《朱子黑格尔太极说比较》一文时，我即指出朱子之太极有两义：（一）太极指总天地万物之理言，（二）太极指心与理一之全体或灵明境界言。所谓心与理一之全，亦即理气合一之全（但心既与理为一，则心即理，理即心，心已非普通形下之气，理已非抽象静止之理矣）。”<sup>④</sup>

贺麟此文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朱熹与陆王的异同，但是认为“朱子有时认心与理一”，而冯友兰1932年发表的《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以及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所说“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二言虽只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的差异”，很可能就是对贺麟调和朱熹与陆王所做的回应。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明确提出朱熹与陆王的差异在于理学与心学的根本不同，贺麟并不以为然。他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认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对陆、王学说太乏同情，斥之为形而下学，恐亦不甚平允。且与近来调和朱、陆的趋势不相协合”<sup>⑤</sup>，并且还认为，“讲程、朱而不能发展至陆、王，必失之支离；讲陆、王而不能回复到程、朱，必失之狂禅。冯先生只注重程、朱理气之说，而忽视程、朱心性之说，且讲程、朱而排斥陆、王，认陆、王之学为形而下之学，为有点‘拖泥带水’”，因而会被人批评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sup>⑥</sup>为此，贺麟提出要建立“程、朱、陆、王得一贯通调解的理学或心学”<sup>⑦</sup>。

自唐文治、贺麟分别从工夫论和本体论层

① 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卷8，《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第1编88册），第163页。

② 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卷8，《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第1编88册），第163~164页。

③ 贺麟：《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7期，1930年11月3日。

④ 贺麟：《与张荫麟先生辩太极说之转变》，《新动向》1938年第1卷第4期。

⑤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23页。

⑥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36页。

⑦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19页。

面调和朱熹与陆王之后,1946年,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从道统的层面讲二者的大同小异,认为他们在“心”与“理”的根本问题上,“仍是一线相延,不离这个万物一体之主潮”,所以,“王阳明之心学与朱晦翁之理学在道统上是一致的”<sup>①</sup>。

1948年,钱穆发表《朱子心学略》,开宗明义便说:“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学者遂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特大较言之尔。朱子未尝外心而言理,亦未尝外心而言性,其《文集》、《语类》,言心者极多,并极精邃,有极近陆王者,有可以矫陆王之偏失者。”<sup>②</sup>又说:“陆王发明心学,到底在人生哲学上不失为一种大贡献,但朱子在此处实也并没有忽略过……与陆王分别甚微,只在入门下手处,虚心涵泳,未要生说,较之陆王似转多添了一层,正是先立定本,喻之乃好,践履之外又重讲学,必如此乃能扩大心量,直达圣境。”<sup>③</sup>显然,这是通过调和朱熹与陆王在本体论上的对立,而将二者的差异回归于工夫论层面,因而与唐文治、贺麟的观点是一致的。

### 三、二者互为补充

民国学人对于朱熹与陆王的调解,不仅表现在他们视朱熹与陆王之学小异而大同、殊途而同归,并在各种层面上加以调和,即使是那些强调二者对立的学者,也尽力阐述二者的互为补充。

早在1925年,董西铭的《程朱陆王哲学之长短得失》在分析程朱与陆王之不同的同时,又指出:“程朱陆王两派哲学,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程朱尚经验,分析绵密,是他的长处;陆王重直觉,简易直截,是他的长处;程朱所得的在道问学一方面,陆王所得的在尊德性一方面。……这种道问学的工夫,是用归纳方法从经验上得来的,所以很绵密;……这种尊德性的工夫,是用演绎方法从直觉上得

来的,所以很直截。”该文最后还说:“经验直觉宜并重,归纳演绎要互用;采取程朱的长处补陆王的短处,采取陆王的长处补程朱的短处;以程朱之所得来正陆王之所失,以陆王之所得来正程朱之所失;是研究哲学的最好方法。”<sup>④</sup>显然更为强调程朱与陆王的互为补充。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讲朱熹属理学、陆王属心学而形成二者的对立,但又明确反对用“唯”字把这种对立绝对化。他曾在《论“唯”》一文中认为,“‘唯什么’有排除什么以外底一切的意义”,所以,“所谓唯什么论之‘唯’,是个很危险底字,至少亦是个很容易引起误会底字”。为此,他还说:“所谓唯心唯物的那个‘唯’字,是要不得底,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或一个大底哲学派别,都不是一个‘唯’字可以把它唯住底。”<sup>⑤</sup>由此可见,冯友兰虽然讲朱熹与陆王属理学与心学的对立,但实际上并不赞同把这种对立绝对化为“唯”字。

1943年,冯友兰发表《宋明儒家哲学述评》,其中指出:“大概程朱派是一面‘致知’一面‘用敬’。陆王派是先‘致知’后‘用敬’。时间上虽有先后与并进之分,而俱为‘致知’和‘用敬’原无二致。”<sup>⑥</sup>认为程朱与陆王在工夫论上都讲“致知”和“用敬”,虽有时间先后上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该文又说:“程朱和陆王两派的方法:一个是一面‘致知’一面‘用敬’,同时并进。一个是先‘致知’后‘用敬’,此不同也引起了相互的批评。陆王说程朱的方法为‘支离’,程朱说陆王的方法为‘空疏’。……照我们意思,两方的批评,都有道理。”<sup>⑦</sup>

次年,冯友兰《儒家哲学及其修正》出版,在“对于儒家哲学之新修正”一章中,阐述了对于程朱修养方法之修正,指出:“我们如明白了哲学的性质和功用,可以得到一个方法,既不支离又不空疏。我以为修养方法,是要‘先立乎其大

①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28~129页。

② 钱穆:《朱子心学略》,《学原》1948年第2卷第6期。

③ 钱穆:《朱子心学略》,《学原》1948年第2卷第6期。

④ 董西铭:《程朱陆王哲学之长短得失》,《来复》1925年第368号。

⑤ 冯友兰:《论“唯”》,《三松堂全集》第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0页。

⑥ 冯友兰:《宋明儒家哲学述评》,《三松堂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4页。

⑦ 冯友兰:《宋明儒家哲学述评》,《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485页。

者’。……我们所谓‘先立乎其大者’,是要先得到哲学上的几个基本观念,——宇宙、理、道体这几个观念。……有此观念后,眼界心胸都已扩大,当然是‘先立乎其大者’了。如此说来,可以不致‘空疏’了。要得到基本观念,光靠上面所讲的一点,还是不够的。因为这样还不能算得到所谓真了解这几个观念。还要从经验方面来体验,此即程朱之格物之道。用‘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方法,以体验之。……这样说来,我们也可说是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方法,并不失于‘支离’。总之,先有哲学的基本观念,是‘先立乎其大者’。用研究功夫,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方法得到哲学的基本观念,是‘先立乎其大者’的方法。这种方法,近于陆王,但并不失于空疏;近于程朱,但亦不失于支离。”<sup>①</sup>在冯友兰看来,将陆王“先立乎其大者”与朱熹“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结合起来,互为补充,就能“既不支离又不空疏”。

除了冯友兰,还有不少学者也强调朱熹与陆王的相互补充。如,1945年出版的熊十力《读经示要》明确讲朱熹与王阳明诠释《大学》“格物致知”的差异,但是又认为,诠释《大学》“格物致知”应当把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朱熹的“即物穷理”统一起来。他说:“余以为致知之说,阳明无可易。格物之义,宜酌采朱子。……朱子训格物为即物穷理,知识即成立。此则宜采朱子‘补传’,方符经旨。”<sup>②</sup>

1946年,张瑞璠发表《朱王学说的比较》,从本体论、知识论、方法论、道德论和修养论五个方面对朱子学与阳明学进行比较,认为在本体论上,朱王的差别是“一为理气二元论,一为唯心一元论”;在知识论上,就大体而言,“晦庵主经验,阳明主直觉”;在方法论上,“晦庵用归纳的时候多,阳明用演绎的时候多”<sup>③</sup>;在道德论上,“晦庵承伊川之说,分性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种,义理之性浑然至善,气质之性则有

善有不善;阳明论性,远本孟氏,认为性是绝对的善,其中不可能有恶的成分”;在修养论上,“阳明与晦庵虽然同样主张去人欲、存天理,但涵义显然不同:晦庵在穷理持善以正性,阳明在除昏去蔽以明性”。该文最后还说:“从上述五方面的比较来看,晦庵与阳明的学说颇有出入。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共同点,即二人都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其学说千言万语,要不外以人心之制裁赴天理之自然,更以天理之自然节吾之心行。”所以,“晦庵与阳明应该算得‘近道’”<sup>④</sup>。这里既讲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差异,又讲二者在经世致用层面上的互为补充。

#### 四、余论

朱熹与陆王的关系问题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早就指出:“自宋及明,名儒辈出,以学说觇理之,朱陆两派之舞台而已。”<sup>⑤</sup>民国时期不少学者都对朱熹与陆王的异同有过论述,既有如汤用彤、谢无量、钟泰、吕思勉等学者讲二者小异而大同、殊途而同归,又有唐文治、贺麟、钱穆等学者从不同层面对二者进行调和;冯友兰等学者虽然将二者对立起来,但仍然强调二者在学术及经世层面上的补充。这就是贺麟所说的朱熹与陆王两派的对立“得了新的调解”。而且,这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对于当今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理论上讲,朱熹与陆王之学存在着学术差异,研究二者的差异与对二者的调解同样重要。民国学人之所以将二者加以调解,较为强调二者的小异而大同、殊途而同归以及互为补充,既有学术上的考量,或许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化经历着从未有过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民国学人更多的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拯救中华民族的资源,而不在于具体分析中国传统学术中不同学

① 冯友兰:《儒家哲学及其修正》,重庆:中周出版社,1944年,第38~39页。

② 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7~668页。

③ 张瑞璠:《朱王学说的比较》(上),《文化先锋》1946年第6卷第6期。

④ 张瑞璠:《朱王学说的比较》(下),《文化先锋》1946年第6卷第7期。

⑤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192页。

派的差异与对立。尽管朱熹与陆王之学存在着差异,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二者加以调解,既是落实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又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如唐文治所说:“宋朱子之教,孔子之真传也;宋陆子、明王阳明先生之教,孟子之真传也。此应时施教之法,其救世苦心一也。”<sup>①</sup>

当今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一点也不亚于民国时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朱熹与陆王异同的研究中,二者的差异与对立受到重视,而对于二者的调解却少有讨论,这与民国时期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对于朱熹与陆王的调解,或许可以为今天研究二者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 The Scholars' Reconciliation between Zhu Xi and Lu-Wang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of China

LE Aiguo

**Abstract:**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of China, many scholars discuss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Xi and Lu-Wang(Lu Jiuyuan and Wang Shouren). Tang Yongtong, Xie Wuliang, Zhong Tai, and Lv Simian thought that these two schools of thoughts are the same in essence while differing in minor points. Thus the same goal is reached by different means. Tang Wenzhi, He Lin, and Qian Mu reconciled the two schools on various layers. Scholars such as Feng Youlan thought that the two are opposite, but still emphasized that they are complementary at academic and practical levels. This is “the new reconciliation”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Zhu Xi and Lu-Wang in Neo-Confucianism, mentioned by He Lin in his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China published in 1945. This opinion is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present view emphasizing difference and opposition.

**Key words:** the Republican Period of China; Zhuxi; Lu-Wang; Reconciliation

**LE Aiguo,**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责任编辑:刘云

<sup>①</sup> 唐文治:《石刻王阳明先生遗像跋》,《茹经堂文集》五编卷5,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980页。